

抗戰期中的杜月笙(三)

萬 墨 林

協助上海敵後工作

民國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，汪精衛從重慶出走，經昆明潛抵河內，發表豔電，主張停止抗戰，對日謀和。二十八年元旦，國民黨中常會決議：汪兆銘危害黨國，永遠開除黨籍，並撤除其一切職務。五月三日，汪精衛在日本人嚴密保護之下，由河內直赴上海。召集偽「代表大會」，議決了所謂「和平大計」，收買黨羽，招兵買馬，積極佈置成立傀儡政權。當時，由於汪精衛在國民黨內地位甚高，許多忠於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人員，和工商金融界人士，受了蠱惑，不明真相，貿然附從，使敵偽勢力因以坐大，而國民黨在上海的組織，幾乎為之整個動搖。

民國二十八年，在軍事委員會第六部主任職的前上海市黨部主任委員吳開先，奉命趕赴上海，吳開先單槍匹馬，悄然由重慶經昆明、河內抵達香港，先去探訪杜月笙先生。

杜先生深知吳開先此行任務之艱險，他吩咐手下，絕對保密，嚴密防護。

吳開先向杜先生簡略說明他的使命，他說：「我要分訪上海工商金融界的重要人物，向他們

說明中央抗戰到底的決心。我身上攜帶有蔣委員長和孔院長寫給他們各位的信。」

杜先生告吳開先說：「你到了上海，應該儘量減少公開露面的機會。我看這樣子吧，你所攜帶的信件和密碼，統統交給我，由我指派妥人代你祕密運進去。此外我再寫信給黃老闖和金廷藻，請他們兩位出面，把你所需要拜望的人，全部請到金三哥的公館，一頓飯吃下來，話也說了，信也交了，免却你一家家跑的麻煩和危險。」

杜先生又向他的左右心腹說：「開兄這一去上海，要緊得很，近來汪精衛、陳公博、周佛海在上海大造其謠，說他們出來『組府』是中央默許的，上海方面已經有不少人上了他們的當，必須開兄去當面解釋，才可以粉碎這幫子漢奸的謠言，有這一層緣故，日本人和汪精衛一定會想盡方法來攔住開兄。」

吳開先接着又說：「我還有第二個任務，留在上海，加強上海的黨務工作，這一點，也要請杜先生幫忙，我希望跟抗敵後援會那一批朋友取得聯繫。」

杜先生連說：「應該應該！」「我跟上海有專用電台，聯絡起來快得很。」兩天以後，杜先生便替吳開先安排了輪船，

以及沿途負責保護的專人，吳開先隨身所攜的密函密碼，也由杜先生派人專程送到了上海。吳開先辭別了香港杜門中人，隻身入虎穴，船抵吳淞口，洋輪船正徐徐駛入黃浦江，一艘汽艇，乘風破浪，越駛越近，終於駛到大輪船旁邊，輪船上立刻有人放下纜繩、船梯，我在小船上帶了兩名從人，搖搖擺擺，爬上梯來。

吳開先很緊張的伏在船欄杆上，當他看清楚了是我，不禁歡聲大叫：

「墨林，你來了！」

我帶領弟兄們，親上輪船迎接吳開先，奉的是杜先生之命。當晚，小艇在法租界外灘靠岸，碼頭附近，黑影憧憧，我附耳告訴吳開先說：

「他們都是在暗中保你駕的。」

吳開先在上海的住處、自備汽車、隨從警衛，全由我安排好了。當天夜裏，我交給吳開先一個小冊子，上面印得有杜先生「恆社」弟兄的電話，地址，我告訴吳先生說：

「杜先生來信交代過了的，所有恆社社員，

從今以後，絕對服從吳先生的指揮，吳先生要喊我們辦什麼事情，只要吩咐一聲就是。還有，恆社社員和相關的人，開的公司行號、茶樓酒館、戲院旅社，吳先生可以隨時指定作交通站、居留

地，或者是秘密聯絡機關。」
翌日早上，吳開先由我派人陪同，分赴漕河涇黃家花園和南陽橋金老公館，拜訪黃金榮和金廷蓀。黃、金二位已經收到杜先生的電報，吳開先要見的工商金融界領袖很多，一次請齊，恐怕敵僞注意，於是改作兩次分別宴敘，爲了保密，便請在南洋橋金廷蓀的家裏。由於請過這兩次客，上海工商金融界首領讀到蔣委員長和孔院長的信，又聽到吳開先當面報告：汪精衛、陳公博、周佛海等背叛中央，賣國求和的真象，以及後方軍民，一心一德，集中全力抗戰到底的決心，吳開先兩度剴切陳詞，全體聽者萬分感動，汪僞

的陰謀，因而一舉摧破。
吳開先在敵僞偵騎四出、危機重重的險惡環境中，雍容鎮靜，指揮若定，在淪陷了的上海一住一年多，順利完成所有的使命，他曾說：
「月笙先生所予的助力，決不是三言兩語所可以說得完的。」
二十八年九月間，杜先生在香港接到了四川好友劉航琛自重慶寄來的航空快信，請他即日飛渝。
劉航琛，四川瀘山人，早歲畢業於國立北京大學經濟系，少年英俊，名動公卿，西北王馮玉祥想延他入幕，他飄然南旋，却又被四川善後督

辦劉湘拉他去管財政，參與密勿，成爲劉湘的智囊、中央與四川間的橋樑。
劉航琛和杜月笙先生，自民國二十一年起，由「神交」而變成玩的朋友，交情非常的深厚。劉航琛篤信要杜先生到重慶，是受了時任行政院長孔祥熙之囑，要杜先生到重慶賦予重要任務。杜先生接到劉航琛的信，立即準備一切事項，前往重慶。
杜先生飛抵重慶見到了孔祥熙院長，除了孔院長交代他的一項特別任務之外，對於加強上海敵後抗日工作，有很大的幫助。

組織上海工作統一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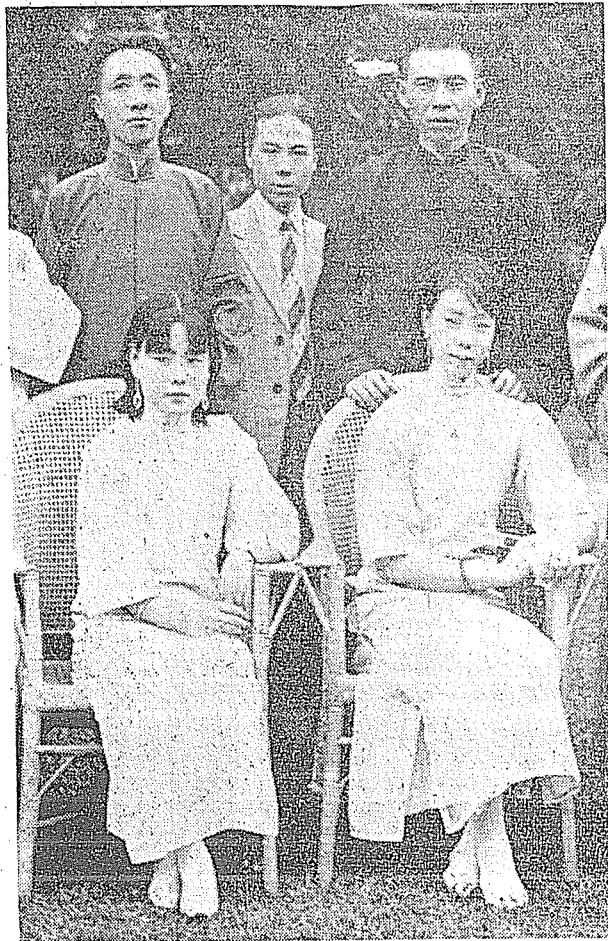
杜月笙先生到達重慶，親眼看到敵機肆虐，濫行轟炸，而大後方的軍民，同仇敵愾，不屈不撓，早上家屋被炸毀了，下午便動員一家大小在廢墟上重建家園，種種精神意志的表現，使他不僅感動，而且振奮。
另一方面，山城是長期抗戰的司令台，中華民國的精神堡壘，長官多、朋友多、學生子更多，朝野人士所給予盛大熱烈而隆重的歡迎，更使他歡欣鼓舞、欣幸萬分。

杜先生抵渝之後，下榻於交通銀行樓上的招待所，由陸京士、于松喬、唐承宗，每天輪流陪伴，照料一切。
杜先生到重慶的消息傳出，在上海從事敵後工作回到重慶的吳開先立即趕往會晤，兩個人一見面，杜先生問吳開先：

「中央統一指揮上海各方面的意見，你提出了沒有呀？」

「我已經向中央和有關方面分別提過，」吳開先答道：「不過，直到今天還沒有聽說下文。」

「那麼，」杜先生再問：「你究竟還要不要再到上海去？」



杜月笙（後排右）早年在上海借錢新之（後排左）與雪豔琴（前排右）雪豔舫（前排左）等合影。

「要去的，我預定在十天之內動身。」
「你不妨等一等，」杜先生說：「我既然到重慶來了，這件事不妨由我直接去說，過兩天你和我一道回香港，等統一工作的辦法決定了之後，你再動身到上海還不遲。」

吳開先答應了，他在重慶多留幾天，坐候佳音，果然，不久中央便決定在上海組織工作統一委員會，並發表人事命令，上海工作統一委員會設常務委員五人：戴笠、俞鴻鈞、蔣伯誠、杜月笙、吳開先，委員則有錢新之、潘公展、陸京士、馮有真、吳任滄、董行白等，指定常務委員吳開先兼書記長。

準備回香港了，杜先生和吳開先一同到戴笠將軍的公館，商定敵後初步工作原則和計劃，照戴笠將軍的意思，趁杜月笙、錢新之兩位在重慶，就便舉行第一次常務委員會。

於是杜先生又在重慶多住了兩天，等開完常務委員會，獲致了一個初步「統一」方案——中央各機關留滬各單位，雖仍分由主管機關負責指揮，但各該單位在滬負責人，每月必須舉行會報一次，相互商洽，並隨時交換情報；一切有關整個問題，均應提會討論，在滬各單位除一體出席外，尤須接受指示負責召集。

吳開先覺得已經很滿意了，欣欣然的和杜先生、錢新之飛赴香港，這一次因為兩人相聚的時日較多，杜先生跟吳開先談了不少次，對於吳開先再度入滬，設計安排，比從前更為週詳縝密，杜先生一再叮囑吳開先說：

「你這一次去上海，一定要事事重頭來起，但凡上次你所住過的地方，所用過的關係，這一次除非萬不得已，你就再也不要去接觸聯絡，免得給敵僞方面輕易的找到了舊線索。」

吳開先唯唯應諾，却是他又提起了通訊聯絡這個大問題，他說：

「工作統一委員會的五位常務委員，杜先生

在香港，戴先生和俞先生在重慶，蔣伯誠先生和我在上海，五個人分了三處地方，將來在必須切取聯絡的時候，可能會感到不便。」

杜先生想了想，慨然答道：

「要解決這個困難，唯一的辦法是建立一個滬、港、渝三角無線電通訊網。現在上海和重慶之間的秘密電台已經設好，重慶跟香港也不生問題，所缺的就只有上海和香港兩處地方的通訊聯絡了。開兄，你放心，我自會設法在香港另設一個專用秘密電台。」

吳開先前行，杜先生又開照他說：

「工作統一大有好處，但是也有危險，不可不防。你們在上海，一個月開一次會，開會的地點和時間，以及負責通知聯絡的，一定要十分機密妥當，依我看來，這些事情，你最好交給萬墨林辦，不要為這些瑣碎小事操心，萬墨林那邊我自會開照他特別謹慎，千萬別讓敵僞特務把你們這些首腦份子一網打盡了，那才叫糟糕。」

後來，吳開先到了上海，他依照杜先生的辦法，把通知開會以及會議時間地點的安排，一概委託我辦理。上海工作統一委員會通常一個月還不止開一次會，因此，我只有把我所能夠找得到的穩妥地點，逐一輪流使用，華格果路接連開過了幾次會，便引起敵僞的注意，在杜公館四週密佈偵騎，他們把華格果路杜公館視作「神祕房屋」。我不敢再用，便打開了辣斐德路杜先生姚氏夫人的十八層樓，不久又嫌公寓人雜耳目也多，再改到南陽橋金廷藻和江一平、朱文德、虞如品、俞松筠以及趙培鑫等的家裏，作為秘密會議場所。

統一委員會在上海做了許多的工作，其中成就最大的，是勸導金融工商鉅子、智識青年以及專業工人，離滬赴港，轉往後方，充實抗戰的力量。至於一些無法離開上海的，則勸他們堅定「抗戰必勝，建國必成」的信念，拒絕與敵僞合作。

因而使上海淪陷區的金融工商，竟能配合中央政府的各項政策。日方逼迫汪偽政權爭取上海金融工商界的支持，但是迄汪精衛之死，以至抗戰勝利，汪偽政權威脅利誘，千方百計，始終拉不到一個上海金融工商界的知名之士。反過來看，當民國三十年重慶發行美金勝利公債，上海銀行錢莊兩業，工商機構，甚至平民百姓，倒能在杜先生和統一委員會的號召之下，爭先恐後，踴躍輸將，募得了相當巨大的一筆數額。

吳開先將上海敵後戰場所獲致的勝利，歸功於兩個人。一是行政院院長孔祥熙，孔祥熙和滬上金融工商巨子素有淵源，他實施廢兩改元法幣政策的成功，使得民國二十二年以至抗戰之前那一段時期，全國工商經濟在破產的邊緣，起死回生般出現了嶄新的局面。孔氏財政政策的成功，挽救了上海的工商金融業者，尚且使他們陸續建立了新的事業，這許多大亨飲水思源，對孔祥熙極有好感，衷心敬服。吳開先為上海統一會的工作，經常往返滬渝之間，每次回上海，孔祥熙必定托他帶許多信，分致滯留上海的大亨們，諄諄鼓勵，殷切慰問，勸勉他們堅定立場，不跟敵僞往來，並且許以抗戰勝利以後，中央必定一體保護，這些信詞懇切，使陷區金融工商業者和中央的關係，從未中斷。

孔祥熙每次寫好了私函，杜先生便以友誼身份，不時利用他的秘密電台，向上海大亨們再三致意，請他們遵照孔院長的指示辦理，至於如何才能與中央的財金政策配合？杜先生更常常有「詳為陳明」的電報拍到上海。所以吳開先強調的說：杜月笙先生是上海敵後戰場的第二位大功臣。

護送專業工人赴渝

戰時工業，在西南大後方次第建立，這是長期抗戰生產戰線最重要的一環，關係抗戰前途至為重大，此一工作由資源委員會執行。資源委員

會在大後方設立了很多工廠，當時我國所有的海岸線全被日軍封鎖，因此機器廠房儘可七拼八湊，唯有熟手的專業工人着實難求，當時有人提出：要找熟手專業工人，唯一的道路是到上海去挖。中央將此一任務交給統一工作委員會，杜先生立電上海吳開先，自己則儘力協助，並且希望吳該去找誰找誰。吳開先很順利的尋到上海總工會地下負責人周學淵。周學淵是上海工運的老前輩，跟陸京士、朱學範等人在勞工界的地位相伯仲，周學淵在二十七年秋天由浙東回上海，業已組成半秘密性質的「工人協力會」，集合愛國工人，共為抗戰效力。當吳開先找到了周學淵時，周學淵業已得到杜先生的通知，周乃利用「工人協力會」這個機構，秘密招徠了數百名專業熟練工人，機器、紡織、造紙各業全都大有人在。為了護送這數百熟手工人脫離上海，轉往西南，杜先生通知恆社社員有錢出錢，有力出力，務必全體出動，數百工人從二十九年夏天開始，分水陸兩路，由恆社社員設法護送。陸路由上海經杭州、紹興、金華，沿浙贛鐵路、萍鄉鐵路而江西、湖南，經黔入川。水路則自上海乘船赴港，然後由杜先生派人一一送入內地，此一計劃的完成，對於戰時生產，抗戰前途，實有極大之貢獻。

吳開先在上海和敵偽從事尖銳鬥爭，徐采丞利用天時地利與人和，成為杜先生在上海的方面大將，為了許多機密任務，他經常往來於上海香港間。二十八年十月，徐采丞方自香港回到上海，不兩天，杜先生在羅士打會客辦公，正和翁左青、胡敘五商議事情，猛一抬頭，看見徐采丞匆匆的推門進來，愣一愣，便問：

「你不是剛剛回去的嗎？怎麼又……」

「有一件緊急大事，不得不原船趕來香港。」

徐采丞回答說：

「什麼緊急大事？」杜先生急急的問。

徐采丞從懷中掏出一張字條，遞給杜先生，

杜先生接過來看時，見字條上只有九個字：

「高決反正速向渝洽。」

「高——是高宗武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這張字條是誰寫的？」

「是黃溯初先生請徐寄願寫的。」

「黃溯初是那一位？」

「他是老進步黨，梁啟超財政經濟方面的智囊，又是早期日本留學生，跟東洋人關係很深，從前當過國會議員，抗戰之前做生意，因為經營失敗，跑到日本去隱居。他是高宗武的老長輩，高宗武從讀書到做官，得到黃溯初的幫助很多。」

「采丞兄，阿是你認得這位黃先生？」

「不，黃先生是徐寄願的同鄉友好。」

「不，黃先生是徐寄願的同鄉友好。」

「不，黃先生是徐寄願的同鄉友好。」

於是，徐采丞源源本本的說了，此次他回上海剛剛到家，徐寄願便登門拜訪，告訴他說：高宗武以外交部亞洲司長的身份，起先駐港從事情報工作，高一向抱着「和平救國」的大願，又因為日本前首相犬養毅的兒子犬養健，跟高宗武是日本帝大的同學。犬養健在日本情報「梅」機關非常活躍，因此高宗武便成了汪精衛與日方之間的聯絡人。

「這個人我曉得，」杜先生說：「前些時香港華僑日報登過一條消息，指高宗武來往上海香港，是在秘密從事謀和。高宗武看了大不開心，揚言要告華僑日報。華僑日報的朋友託我出面調解，我叫人去跟高宗武說了，這位朋友很落檻，一口答應看我面子，打消原意。」

「杜先生和高宗武之間還有這一層關係，那就更好了，」徐采丞欣然的說，又道：「高宗武後來跟汪精衛到了上海，一直都是負責辦交涉的重要人物，但是不久他到東京，近衛首相把『中日密約』開出來，他一看之下，發現東洋人所謂的

『和約』要比二十一條還狠。假使簽訂了這項『和約』的話，那麼整個國家民族的命運都要斷送，為此他覺得徬徨苦悶，於是他跑到長崎曉濱村，找到了他的父執黃溯初，向他討教。」

「是黃溯初教高宗武反正的？」

「高宗武自己早有這個意思，」徐采丞答道：「據黃先生說：高宗武認為他所從事的是和平救國工作，決不是賣國求榮。黃先生不過鼓勵他，點醒他，答應幫他的忙，代他設法向重慶方面接洽。」

但是，黃溯初因為自己是進步黨人的關係，他對國民黨不無偏見，他在長崎和高宗武相約，高宗武回滬不久他也到了上海。徐寄願和黃溯初是同鄉友好，黃溯初便去找到了徐寄願，一席密談，末後提起如何安排高宗武反正，要使他平安逃出上海，又得保證國民政府不咎既往，許他將功折罪。徐寄願一聽之下，當即說道：

「你要找這麼樣的一個人，只有杜月笙。」

黃溯初說：「杜月笙我雖然並不認得，但是這個人行俠仗義，無人不知；他能答應承擔這一件事，我便放心。」

杜先生聽徐采丞說到這裏，岔嘴問道：

「高宗武是負責辦理日汪交涉的人，他若反正，那麼，汪精衛跟日本人訂的密約內容，是不是可以帶得出來，公諸於世呢？」

徐采丞說：「那當然沒有問題。」

於是，杜先生躍然而起，雙手一拍高聲說道

「采丞兄，這件事情關係抗戰前途，確實值得一試。你便在香港住兩天，我乘最近一班飛機到重慶，我要去見蔣委員長，當面向他報告。」

時在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一月五日，杜先生自香港直飛重慶，晉謁蔣委員長，請示高宗武反正事宜，應該如何處理？

杜先生到重慶後由張羣先生陪同晉謁最高領袖蔣委員長，杜先生得到委員長的指示，從速返港，秘密進行。當下他十分興奮，立即搭中國航空公司飛機，離開重慶，重回香港。

杜先生搭乘的那一架飛機，飛到半路，碰到日本軍機掃射追逐，飛機師爲了保全飛機和旅客的生命，拚命盤旋升高，以求逃脫敵機的轟擊。當年的民航機既沒有空氣調節，又缺乏舒適安全設備，杜先生在飛機上，一時但感到天旋地轉，身子搖來擺去，時下時上，轉得他頭暈眼花，幾乎昏厥。最後，飛機升到八千公尺，高空空氣稀薄，杜先生呼吸艱難，幾度窒息。飛機險到達香港。杜先生却喘息不止，躺在飛機上。機場醫護室，尋了兩個抬担架的工友，把無法起立的杜先生抬下飛機。

這便是使杜先生煩惱痛苦十二年，嚴重損及他的健康，最後終於在六十四歲難免一死的氣喘病之由來。他在那次敵機襲擊中逃出了性命，却換來一副百病叢生，經常不適的身體。

在担架上被抬回家中，龐京周給他打針吃藥，緊急救治，杜先生喘過氣來，立即在病榻上欠起身軀跟徐采丞說：

「請你即刻回上海，代我辦兩件事情。第一、請黃溯初先生火速來香港，跟我當面接洽。第二、轉告萬墨林他們，祇要高宗武說聲走，便不惜一切代價，務必把他和他的家眷先送到香港來。」

徐采丞回上海不上十天，黃溯初先生飄然而來。杜先生大病方癒，親往迎迓，爲了安全保密，就請黃溯初在杜公館下榻。

黃溯初和杜先生促膝密談，黃把高宗武三度赴日的種種經過，中日密約的要點，逐條逐項，向杜先生細說。杜先生說這實在太多了，一下子難以記得住。於是黃溯初親筆給杜先生寫了一份報告要略，杜先生雙手接過報告要略後說：

「我明天再搭飛機到重慶去。」

杜先生冒險二度飛渝，曾帶了龐京周醫生同行，以防萬一。托天之幸，安穩到了重慶，委員長即刻傳見，杜先生報告完畢，委員長便寫了一封親筆信，交給杜先生，要他設法轉交高宗武。杜先生得到委員長的親筆函件，第二天便飛回香港，將委員長的親筆信交人秘密攜往上海。

由於敵偽方面戒備森嚴，防範緊密，徐采丞要想營救高宗武脫險，確實很不簡單。同時由於日汪之間的「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」談判，是在十二月二十九日完成，簽字儀式，則訂在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舉行，高宗武決心等到密約簽訂取得原本後，再呈獻中央，揭破汪精衛等賣國的勾當。因此他到元月四日方始成行，行前，他又救出了正有生命危險的陶希聖先生。

汪精衛成立偽政權，先行設置的機構只有外交、宣傳和警衛三個「部」，當時「外交部長」是汪精衛自兼，「警衛主任」周佛海，副主任李士羣、丁默村，宣傳「部長」一席，則由陶希聖充任。

「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」開始談判，陶希聖一看日方提出的條件，日人全面控制中國的野心昭然若揭，他們把中國劃分爲「滿洲國」、「蒙疆自治政府」、「華北」、「華中」和「華南」五種地帶，而把海南島和台灣一般列爲日本的軍事基地。五大地帶不會包括外蒙、新疆、西南和西北，以及西藏，那便是說，日蘇業已有所勾結，他們要共同瓜分中國。陶希聖認爲，像這樣「白紙寫上黑字」，要借中國人之手去簽署，這件事是「斷不可能的」，因此他拒絕簽字於中日密約，一面稱病不出，一面暗中策劃如何出走。

陶希聖的態度使汪精衛、周佛海等大起疑忌，二十九年元旦前後，有人秘密通知陶希聖，說是李士羣、丁默村主持的汪偽特務機關極斯斐爾路七十六號，正在計劃刺殺他，陶希聖兩夫婦

當時決定：「如果不能逃出上海，只有自戕之一法。」

協助高陶脫險赴港

二十九年元旦，高宗武忽然在法租界環龍路陶希聖住宅出現，他來探病，並且拜年，當時陶希聖告訴高宗武說：「他們有陰謀不利於你，你怎樣？」

高宗武便說：「走了吧。」

徐采丞和我已經遵照杜先生的吩咐，替高宗武預備好了船票，同時嚴密擬訂保護他順利成行的計劃，臨時加上陶希聖同行，當然不致發生什麼困難。二十九年元月四日，上午，高宗武按照預定計劃登上了美國輪船「胡佛總統號」。陶希聖則獨自一人，乘車到南京路國泰飯店前門，下車後，進入大廈，趕赴後門口，換乘一輛出租汽車，直奔黃浦灘頭，離滬赴港，順利成行。關於杜先生生命我護送陶希聖先生等離滬赴港的經過請參閱拙著「滬上往事」。

「日汪密約」經由沈惟泰所拍的底片一共沖洗了兩份，一份送呈重慶中央，一份由高宗武夫婦共同署名，交杜先生轉致中央通訊社發表。

「日汪密約」之揭佈，使世界各國國際然日本侵華的野心，以及中日戰爭的本質。於是，英、美、法諸國對中日之戰的態度，漸趨積極，紛紛發表聲明：維護「九國公約」，否認汪偽政權。民國二十九年二月十三日美國國會通過對華貸款二千萬美元，三月七日再由聯邦進出口銀行貸予滇錫貸款二千萬美元。英法美等國更在歐戰爆發前後，抽調兵力，增強遠東地區的防務。

高宗武到香港後決心出國留美，繼續深造，由杜先生經手替他辦好了護照。當他知道杜先生因爲他們的事高宗武險墮了氣喘重症，他非常不安，曾在美國爲杜先生遍訪名醫，請教病因及治療方法，並且經常寄回藥品，直到民國三十八年大

(三) 杜月笙的中期戰抗

陸撤退，高宗武特往日本覓得一處與氣喘病患相宜的地方，勸杜先生舉家東渡，以便休養。不幸杜先生避亂香港，一病不起；高宗武在美驚悉噩耗，至為傷悼，曾請他的好友李毓田代表致祭。民國五十六年夏季，高曾專程來台一行，親赴杜先生墓前，默哀致敬，憑弔良久。

陶希聖則由杜先生派人嚴密保護，暫住九龍。爲了「高陶事件」，汪精衛對杜先生恨之入骨，汪曾恨聲不絕的說：「我跟他有什麼難過？他竟這麼樣來對付我！」

當時，汪曾下令偽政府特務頭腦李士羣，專程到廣州指揮，派遣兇手，到香港刺殺杜先生。幸虧杜先生防範嚴密，刺客沒有下手的機會。但是汪精衛仍不甘心，他再派人運動香港差館（警署），藉口有人密告杜月笙是「流氓」，要把他驅逐出境。

王新衡首先偵得消息，立即通知杜先生。但是杜先生不肯相信，他淡然一笑，安慰王新衡說：「不會有這種事情的，新衡兄，你放心好了。」

但是過不了幾天，柯士甸道杜公館和告羅士打的長房間，竟有差館的人跑來說是奉命搜查。這一來，杜先生方知事態嚴重，於是他才去跟王新衡商量。王新衡覺得，要消除汪精衛的陰謀詭計，必須把事體鬧到香港總督那邊去，當時，俞鴻鈞正任中央信託局局長，住在香港，俞鴻鈞在担任上海市長時期，曾招待過香港總督，和港督私交彌篤。王新衡建議俞鴻鈞，以非正式的國民政府代表身分，向港督送上一份備忘錄，並說明杜月笙是國民政府委派的賑濟委員會常務委員，又是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。此外尤其兼任交通銀行的常務董事、中國通商銀行董事長。港警搜查中國官員的住宅及其辦公會客的地點，是非法無禮的行動。港督奉到了俞鴻鈞的備忘錄後，當即表示道歉，同時保證此後不會再有類似情事

發生。一樁公案，就此了結，汪精衛的報復，迄汪本人病逝東京，狡計一直無法得逞。

協助志士抗日殺奸

汪精衛等一千漢奸，在南京成立偽政權，邀約德、意、日三國駐上海的外交官、僑領、使館人員，由日、偽軍隨軍保護，自上海專車到南京，參加汪偽的「還都典禮」。當該一列車駛近浙墅關，便由忠義救國軍地下工作者預埋炸彈，轟然一聲，列車全毀，死傷數百人，釀成重大慘案。杜先生在香港得到捷報，領首微笑說道：「我們送的這一串鞭炮，着實不少！」

軍統局在上海設有工作站，站長周道三，情報工作「行動」一環，則由戴笠將軍親自指揮，戴將軍覺得上海需要成立「行動小組」，便請杜先生介紹一位幹員担起該一出生入死、冒險犯難的要緊任務。

杜先生介紹的是陳默。陳默，字冰思，是杜先生的得意門生，在軍校高教班受過訓，抗戰前曾任上海警備司令部稽察處經濟組長。頭腦精細，有軍事訓練基礎，條件非常適合。

陳默既奉杜先生之命加入軍統，展開「行動」，他便有資格在黃浦灘「要人有人、要錢有錢、要槍有槍」，他因爲杜先生的關係獲得廣大羣衆支援。上海行動小組和忠義救國軍老幹部嚴密合作，制裁敵偽的鋤奸工作，自此轟轟烈烈展開。二十七年一月十四日，正在活動上海兩特區法院院長職務的范程，是在黃浦灘上享譽十多年，專替強盜開脫的所謂「強盜律師」，當日他走到威海衛路一百五十五弄二十號他家門口，迎面飛來一顆槍彈，猝不及防，當即倒地斃命。暗殺的手法乾淨俐落，是爲陳默接生的第一件得意傑作。

緊接下來，「上海市民協會」負責人尤菊蓀、「市民協會委員」楊福源、「上海市政督辦公署秘書長」任保安，「市民協會主席」顧馨一，

日本人偽綏靖第三區特派員中本達雄，都先後遇刺，飲彈畢命，在七月底前陸續被刺的尤有范蒼生和鄭月波。

在這許多被誅鋤的人羣中，有杜先生的老朋友，如自營的中央飯店被殺的陸連奎，便是公共租界跟黃金榮地位相埒的清幫弟兄，捕房頭腦，陸連奎早年一向跟杜先生交誼密切。再如法捕房的副探長曹炳生在馬路上中槍，他等於是杜先生的部下，又如當年同心協力，開大公司的知己心腹俞葉封，也因爲參加張嘯林所組織的「新亞和平促進會」，主持棉花資敵工作，被杜先生的學生子，大義滅親，用機關槍掃死在更新舞台的包廂裏面。

鐵血鋤奸雷霆萬鈞，民心大快，同仇敵愾之心，益更增漲，但是，杜先生內心中的矛盾、痛苦與日俱深。俞葉封被殺之後不久，他已不時的在爲張嘯林擔心。民國二十八年夏，張嘯林靦顏組織「新亞和平促進會」，爲敵張目，幫東洋人辦事。他一心一意，想當一任「上海市長」或者是浙江「省政府主席」。

剛巧時機漸將成熟，杜先生學生子的槍口，也就開始奉命瞄準了張嘯林，杜先生在香港日夜焦灼，他無法阻止戴笠將軍的執行命令，又不忍老把兄死在他的愛徒之手，無可奈何的兩難之中，他確曾想盡辦法，輾轉請朋友去勸張嘯林保全晚節，懸崖勒馬。可是，張大帥那種一語不合，立刻豹眼一翻，破口大罵，「媽特個××」聲聲不絕，誰又敢去溯彼之怒，自討沒趣？

張嘯林的性情，和杜先生完全相反，時時刻刻都在想做官，却是不愛做國民政府底下的公務員，他的官癮是從戲台子上，和那般北洋軍閥身邊看出來的。在張嘯林的心目中，也許當當「漢奸官」還可以逞逞威風。

杜先生曉得張嘯林的心理，因此一直爲張暗地着急，唯恐他一撈上了漢奸官，必定會受到愛

國志士的制裁。果不出杜先生的所料，張嘯林終於被忠義之士林懷部所誅殺。



杜月筓(中)與汪竹一(左)邊定遠(右)在陪都重慶街頭合影。

久又有杜先生的另一位好朋友，中國通商銀行先前的老老闆傅筱庵，傅筱庵落了水，負責執行的人，便是杜先生舊日的保鏢，他得到我的允許，拿了杜公館兩萬大洋的工作費，說動常到杜家走動的傅宅廚司朱老頭，在禁衛森嚴、如臨大敵的虹口傅市長公館，一斧頭送了傅筱庵的終。

爲了便利港、滬兩地的聯絡和通訊，杜先生叫他的得力助手，精明能幹、膽識俱壯的徐采丞，利用徐和日本影佐特務機關的關係，在上海設立秘密電台，和杜先生經常保持聯繫，因此使軍統方面指揮上海地下工作人員，如手使指，極其靈活。徐采丞不便和地下工作人員直接聯絡時，杜先生便喊我到香港來，深居簡出，受了一個星期的臨時訓練，當我重返上海時，就開始擔任上海地下工作者的總連絡之責。

從民國二十七年元月，到二十八年年底，陳默領導的行動小組，一共執行了六十二名日本人、大漢奸。弟兄們在上海工作站的指揮之下，從事過二十二次造成敵人重大損失的破壞工作。這些忠肝義膽、慷慨義烈的熱血男兒，鬥起東洋人來，膽子大得嚇人，把炸倉庫、燒棧房，當成了家常便飯，即連重重戒備，停泊江心的日本軍艦，也敢摸上去破壞爆炸，殺人放火，如入無人之境。曾經摸上唐山丸，燒了兩百萬元的貨和一艘大輪船。運輸艦廬山丸在楊樹浦瑞鎔造船廠修理，剛剛修好，便被大家放一把火燒掉，接下來給大家焚毀的日本運輸艦，還有順丸、沅江丸、南通丸、音戶丸，至於作爲水上運輸工具的軍用小汽艇，也給大家燒燬二十艘之多。持續的暗殺，持續的爆炸、不斷的縱火、不斷的破壞，造成日軍重大的損失不算，軍統人員

和杜門子弟的英勇，簡直嚇破了皇軍的膽，日軍在完成佔領工作的大上海，時時被襲擊，處處遭暗害，一名憲兵補充隊長高英三郎，生病住進日軍野戰醫院，居然被杜門中人下了毒藥，毒發身死。兩個日本間諜，「上海市政府」顧問池田正治和喜多昭次，大白天裏在四馬路望平里熙來攘往的人叢中散步，突然之間，砰砰兩槍，立即倒臥於血泊之中。——由於上海行動隊的神出鬼沒，種種英勇大膽的表現，使得上海敵偽風聲鶴唳，草木皆兵，一天到晚，坐臥不寧。東洋人終於發現，他們損失數萬精兵，激戰整三個月，將上海佔領以後，反而寸步難移，行動不得自由，無數日本軍民，反而落入了陰風淒淒的死亡陷阱。

組人民行動委員會

由於全民一致支持抗戰，使軍統局長戴笠將軍起了一個構想，他要促使海內外所有的洪門、清幫、理教，全部納入一個最高組織，使遍佈各地不計其數的幫會中人，都能屹立在抗戰的大纛之下，團結奮鬥，殺敵報國。

戴將軍把這一構想告訴杜先生聽，獲得杜先生的熱烈支持，爲了便於進行，杜先生建議戴笠將軍先自和洪門清幫在香港的關係入手。於是，二十九年夏，戴笠將軍挽請吳鐵城出面，在香港請過一次客，香港洪門領袖如梅光培，客地清幫首腦杜月筓以次，一致出席，杯觴交錯，一席盡歡，戴笠將軍便以這一次的大宴會爲基礎，畫出了中華民國人民行動委員會的藍圖。

人民行動委員會幾經努力，終告組成，這是中國自有幫會以來，空前未有的一大盛舉，新成立的人民行動委員會，決定採取集體領導制，推由杜月筓、楊虎、楊慶山、張樹聲、向海潛、韋以敵、田得勝等爲常務委員，戴笠將軍幕後策劃督導。就中張樹聲是華北的洪門大爺，張門勢力遍及全國，楊虎是海員的領袖，全球各地的船舶碼頭，他都能通聲息，趙慶山是華中重鎮，洪

(三) 杜先生的中期戰抗

門並世無雙的「雙龍頭」，向海潛在軍界之中潛力雄厚。韋以馘號作民，在北洋政府交通部裏，向有「不倒翁」之稱，交通界中，自機關職員以至工人苦力，他的徒弟很多。田得勝是四川袍哥的首領之一，重慶田大爺天下聞名，憑他一聲招呼，全四川的袍哥弟兄，俱將競起竊從。

人民行動委員會的成立，使全國幫會人士歡欣鼓舞，竭誠擁護，這一個機構設在重慶香水順成街三十七號，由幫會領袖唐紹武獻出了一幢大住宅，第一任祕書長趙世瑞，是戴笠將軍的得力助手，在重慶衛戍總司令部工作。規定每週開會一次，籌商如何支持抗戰的各項重大問題。

杜先生為成立「人民行動委員會」的事，再度赴渝，這一回杜先生自河內經昆明轉往重慶，當時全國各地幫會領袖俱已到齊，山主龍頭舵把子與大爺們，齊集南溫泉，開過一次盛況空前的大會。會中的洪門大爺們曾經給杜先生一份殊榮，一致推舉他為總龍頭，但是杜先生則說他德薄能鮮，不敢接受。

由於幫會弟兄人多勢壯，在全國每一角落都有其影響，因此，自杜先生負責實際領導責任以後，人民行動委員會確曾為國家民族做了不少的事。譬如說協助役政人員推行兵役，發動各地人民救濟難胞，以及捐獻金錢、打游擊、從事種種地下工作，其中表現最特出的是捐款獻機，一次捐獻飛機二十架，在重慶珊瑚壩機場舉行「獻機典禮」，構成八年抗戰中一場情緒熱烈、場面壯觀的動人特寫鏡頭。

杜先生在重慶推動支援抗戰工作，做來有聲有色，時間到了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下旬，我在上海滄洲飯店前，被任精衛特工總部極斯斐爾路七十六號的打手，橫拖豎曳的捉了去，立即施以酷刑，老虎凳、辣椒水，拷掠備至，打得我死去活來，體無完膚。

我被捕的消息傳到重慶，杜先生和戴笠將軍大為震驚，立即電知上海吳開先等人，從迅速移住

處，變更聯絡方式，同時，杜先生更自重慶匆匆返港，竭力設法營救我，重慶和上海敵偽之間的地下工作血門，自此又面臨短兵相接的階段。

民國二十九年八月十四日張嘯林見報，十日傳彼庵遇刺，十一月二十九日，日本正式承認汪精衛偽政權，在南京簽訂「調整中日關係條約」，發表日「滿」「華」共同宣言。這一天，汪記政府開張，羣奸邀了許多德義日軸心國外交使節、日軍高級軍官，乘「天馬號」專車，自上海趕赴南京，參加簽字典禮。消息立刻經由上海祕密電台，報到重慶，戴笠將軍當時決定，把這列專車炸毀，造成重大傷亡，給汪精衛一次打擊，使他面上無光。

爆炸火車任務，由上海忠義救國軍地下工作人員，配合軍統局蘇州站，聯合執行。他們派出警衛，掩護爆破隊，乘夜潛至蘇州城外京滬鐵路線上的李王廟，將地雷炸藥，埋藏在外跨塘附近的鐵軌中間，引線長達三百公尺，一直通到一道茂密的樹林之中，由詹宗像與薛堯負責按動電鈕。上午九點鐘，天馬號專車駛來，詹薛兩勇士立即將電鈕按下，但聽一聲巨響，地雷爆發，天馬號列車頓告傾覆，一時斷瓦決腹，血流盈野，哀呼慘叫之聲，聞於數里。這一次爆炸，全車的人不死即傷，損失慘重。天馬號翻覆後，詹宗像和薛堯雖知目的已達，可是他們膽子很壯，穿出樹林探看殲敵成果，不幸被日軍發現，密集掃射，中彈成仁。

這一次爆炸事件，日方死了兩名大佐（上校），兩位日本內閣的慶賀專員，情報員多人，還有德義使節及隨車日軍，死傷共一百餘人。爆炸消息傳到南京，汪精衛狼狽萬分，觸足霉頭。汪精衛暗恨重慶地下工作人員辣手破壞行動，於是在「軍事委員會」之下成立「調查統計部」由特務頭子李士羣負責主持。

汪精衛給李士羣的第一項任務，便是取杜月笙的性命，同時打擊並瓦解重慶地下工作人員在

上海的活動。李士羣是一個狠腳色，豁達有膽略，跋扈而聰明，辦事有條有理，他奉了汪精衛的密令，精神抖擻，雙管齊下，一面誘捕重慶和共產黨派在上海的地下工作者，尤其着重忠義救國軍的幹部，和杜先生相關人物，於是何行健、楊傑、林之江、王天木、蘇成德、萬里浪、唐惠民、朱文龍、馬嘯天等都相繼落入陷阱，李士羣對他們威逼利誘，無所不用其極，終於使這般意志薄弱者搖身一變，甘為虎俛，成為極斯斐爾路七十六號汪偽特工部的一批重要幹部。同時李士羣東施效顰，他也要運用清幫力量，負責行動工作，只是黃浦灘上有頭有臉的清幫大亨，唯杜先生馬首是瞻，李士羣拉不動，他只能退而求其次，拉到杜先生好朋友季雲卿的司機、門徒吳四寶，李士羣千方百計把吳四寶拖進七十六號，李和吳四寶結拜兄弟，派他當「警衛大隊長」。

關於汪「主席」當面交代的任務：謀刺杜月笙，李士羣在七十六號加強部署完成以後，我誤中奸人之計落入圈套，關在七十六號嚴刑拷打的同時，李士羣親赴廣東祕密策劃，於是香港告羅士打飯店門前，幾度發現可疑人物，却是若輩憚於杜先生的聲威，屆時不敢下手，其結果只不過給杜先生造成一場虛驚，促使杜先生嚴密戒備，讓李士羣無懈可擊。賄買香港警署陰謀驅逐杜先生出境也是李士羣的傑作，不料又被王新衡請出俞鴻鈞來，以一紙備忘錄提請港督一新觀感而告失敗。

我於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四點鐘被誘捕，當時正值上海地下工作的最高潮時期，中央派有三位大員常駐上海，中央常務委員蔣伯誠是中央代表，吳開先以中央組織部副部長，上海工作統一委員會常務委員的身份實際領導責任，青年團吳紹澍也在上海另設單位搜集情報。我奉杜月笙先生之命，對這三位大員都要設法掩護，盡力協助。關於我被捕入獄遭受奸偽迫害，以及杜先生大力設法營救脫險出獄，已在拙著滬上往事一書中有詳細記載，茲不多贅。